

越南的明鄉人與華人移民的族群認同 與本土化差異*

蔣為文**

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

摘要

17 世紀明末清初，因戰亂關係而有大批華裔族群從中國向外流竄。東寧王朝垮台後，鄭成功的舊屬楊彥迪及陳上川等人率兵三千餘人投靠當時越南中部的阮氏政權。這些較早遷徙到越南的華裔族群及其後代目前在越南通稱「明鄉人」。越南明鄉人就如同明鄭時期流亡到台灣的漢人一樣，經由通婚及各式本土化過程，已建立起強烈的在地認同。基本上，明鄉人均使用越南語且完全融入越南當地文化，其身分證件的民族類別也登記為京族。繼明鄉人之後，較近的遷徙時間是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前半段。這段期間陸續有華裔族群移入越南。這些較晚到越南的移民目前在越南通稱為華人，主要包含來自中國講廣東話、福建話、潮州話、客家話及海南話等不同語言的族群。這些族群在不同時期陸續移居到越南，其越化的程度較明鄉人低且仍保有某種程度的族群母語及文化。本研究之目的擬以人類學「土著化」的角度探討明鄉人及近代華人遷徙到越南後的族群認同與本土化過程之異同。

關鍵詞：越南、明鄉人、華人、本土化、認同

* 本論文為國科會計畫，編號：NSC101-2410-H-006-078，及 NSC102-2410-H-006-036 的研究成果之一。本論文的部分成果曾在 2013 年及 2012 年台灣的東南亞研討會發表，在此感謝研討會評論人給予的改進意見。

** 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作者目前於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研究所客座研究。感謝三尾裕子所長及相關同仁在此期間提供許多有益的資料及相關協助。另外，也感謝大阪大學的清水政明教授熱心提供相關文獻。

壹、前言

公元1644年農民軍領袖「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大明帝國亡。原為明將、鎮守山海關的「吳三桂」帶領立足於東北的滿清軍隊入關，不久清軍擊敗農民軍並遷都北京，開啓滿族人統治中國的歷史。大明帝國滅亡後，殘餘的宗室與遺將各自四散，形成與大清對抗的「南明」與「明鄭」時期數十年。這些四散的皇族宗室、官員、遺將與難民等分別遷徙到台灣、越南及東南亞各地（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78；陳烈甫，1983；吳鳳斌，1994；李恩涵，2003；陳錦昌，2004；湯錦台，2005）。

明末兵荒馬亂之際，台灣正由荷蘭人統治當中。公元1661年，因南明「隆武」皇帝賜姓「朱」而有「國姓爺」之稱的鄭成功率二萬五千士兵攻打佔領台灣的荷蘭人（史明，1980：102；王育德，1993：56；湯錦台，2001：137；陳錦昌，2004：102）。1662年荷蘭人投降，台灣自此開始由鄭成功家族統治直至1683年「施琅」率領清軍攻佔台灣為止。這些在荷蘭時期陸續移民到台灣開墾的漢人及由鄭氏王朝帶來的士兵、家眷及難民共計數萬人。這些人，除了部分被遣返中國之外，其餘多數與台灣當地的原住民通婚及同化，最後「本土化」形成台灣人。

大約同時期，依據越南黎朝正史《大南寔錄》前編卷五之記載，鄭成功的舊屬龍門總兵「楊彥迪」（*Dương Ngạn Địch*）、高雷廉總兵「陳上川」（*Trần Thượng Xuyên*）等人於1679年¹率兵三千餘人投靠當時越南的阮氏政權²（藤原利一郎，1949：379；陳荆和，1960：436；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32；鄭瑞明，1976：25-26；許文堂、謝奇懿，2000：3；*Đặng Thanh Nhân*，2010：8；三尾裕子，2008：5）。此外，明朝遺臣後代、廣東雷州莫

¹ 鄭瑞明（1976：26）認為楊等入越時間應該是1681年「三藩之亂」結束以後較合理。根據越南胡志明市「明鄉嘉盛堂」（亦即明鄉會館）的介紹手冊，楊彥迪等人入越時間為1683年（*Đặng Thanh Nhân*，2010：8）。陳荆和（1960：454）亦認為應在1682年底至1683年之際。

² 公元16至18世紀左右，越南正處於南北分裂時期。北方為鄭氏政權，南方為阮氏政權（或謂廣南國），雙方大至以目前越南中部的靈江（*Sông Gianh*）為界（*Trần Trọng Kim* 2002：312；郭振鐸、張笑梅，2001：459）。

府城人「鄭玖」(Mạc Cửu)於1671年率眾四百餘人前往柬埔寨南方蠻荒之地開墾。後來鄭玖於公元1708年歸順越南阮氏政權並將開墾之土地送給越南顯宗孝明皇帝，因而獲封「河仙鎮大總兵」(藤原利一郎，1949：383；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219；陳重金，1992：242；許文堂、謝奇懿，2000：5)。這些不願被滿清統治的明朝遺民最後落腳越南，大多數均與當地越南女子通婚而逐本土化，形成目前通稱的「明鄉人」(người Minh Hương)。越南明鄉人就如同明鄭時期流亡到台灣的漢人一樣，經由通婚及各式本土化過程，已建立起強烈的在地認同。基本上，明鄉人均使用越南語且完全融入越南當地文化，其身分證件的民族類別也登記為「京族」(Kinh 越南主體民族)。

繼明鄉人之後，較近且顯著的遷徙時間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半段，這段期間陸續有華裔族群移入越南。在日本侵略中國及國共內戰期間，大批華裔族群移居到越南避難。這些從中國移居到越南的華裔族群在越南的民族認定上被分為華族(Hoa)、客家(北部常稱為Ngái，南部常稱為He³)與Sán Dìu三族。依據越南於2009年的人口普查結果，共計有823,071位華人。華族其實是複數族群的綜合體，主要包含來自中國講廣東話、福建話(以漳州、泉州及廈門為主)、潮州話、客家話、海南島等不同語言的族群。這些族群在不同時期陸續移居到越南，其越化的程度及保留族群母語及文化的程度也不同。其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亦隨不同情境而有所變動。總體而言，相較於明鄉人的越南化，這些較晚才遷徙到越南的華裔族群在某些程度上還保有祖國中國的原鄉認同。也因強烈的原鄉認同而與當地社會產生衝突，造成越南於1950至1970年代採取明顯的排華政策。

台灣於1945年二次大戰終戰後也遭遇以蔣介石為首的百萬中國軍民的遷徙入台⁴。這些來自中國各省份的中國人猶如17世紀的明鄉人般地流落到台灣。由於移居台灣的時間仍短，土著化程度有限，故大多數仍存有強烈的中國認同。這些中國認同當然與本地的台灣認同起衝突，而有所謂的

³ 越南文 Người He 的原意為「華夏人」。

⁴ 依據黃宣範(1993：25)估計，1949年移居台灣的中國軍民約121萬人，本土台灣人約660萬。

「省籍衝突」或「族群衝突」；這些衝突的本質其實是國家認同的差異，與越南的排華運動本質類似。

本研究之目的擬以人類學「土著化」的角度探討明鄉人及近代華人遷徙到越南後的族群認同與本土化過程之異同。早期關於明鄉人及華人的研究多數以文獻的考究為主，近年以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研究所三尾裕子為代表的跨國研究團隊則以人類學的訪談方式到越南進行實地訪查，其成果提供了不少新的發現與見解(三尾裕子，2007：2008；芹澤知広，2007；Trần Hồng Liên, 2007；中西裕二，2008)。有鑑於文獻考究對本研究議題的侷限，本論文的研究方法除了包含文獻回顧之外並到越南針對明鄉人及華人進行實地訪問與調查。越南田野訪查時間地點分別為 2008 年 9 月 2-3 日(會安⁵)、2011 年 8 月 9-14 日(胡志明市⁶及前江省⁷)、2012 年 11 月 16-19 日(胡志明市及同奈省的錦美縣⁸) 及 21-23 日(會安)、2013 年 1 月 31 日-2 月 6 日及 9 月 28 日-10 月 2 日(胡志明市)。

貳、專有名詞界定與討論

本論文所談的「本土化」是指人類學角度的「土著化」(indigenization)概念，亦即由移民社會(immigrant society)變成「土著社會」(native society)的轉變過程。例如早期漢人由唐山移民來台灣時，剛開始逢年過節會想要回到故鄉唐山和親人團圓，甚至若往生後也想要落葉歸根將屍體送回唐山埋葬。這是移民社會現象，也就是移民者仍有過客心態。但經過一定的時間與社會情境的發展，那些漢人移民漸漸地「他鄉變故鄉」發展出在地認同，過年、過節不再回去唐山，去世後也直接埋在台灣。最終那些漢人移民認為自己也是台灣人，台灣是他們的新故鄉。這就是土著化的過程。陳其南(1994：92)指出，由 1683 到 1895 的 200 多年當中，台灣的漢人移

⁵ 越南文 Hội An。

⁶ 越南文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⁷ 越南文 T. Tiền Giang。

⁸ 越南文 H. Cà Lâm MỹP。

民社會漸漸的形成土著社會⁹。意即在日本與中華民國政權陸續來到台灣之前，台灣早已形成土著化社會。至於本文討論的二個主要對象明鄉人與華人移民到越南後，是否仍存有移民心態與現象或已完全本土化？若已本土化，其程度與內涵為何？此為本研究關心之焦點。

本論文內的專有名詞「華裔」、「華僑」、「華人」、「中國」、「唐人」、「漢人」、「明人」、「清人」等意涵稍異。茲解釋與定義如下：

「華裔」是指從中國移居他國後所傳的後代。就血統來看，這些人有純粹華人血統（即父母均為華人），也有混血種（譬如，父親為華人或華裔，母親為當地女子）（陳烈甫，1983：12）。隨著移民定居當地的時間久遠，通常華裔的華人血統會逐代減少，且已取得當地之國籍。通婚通常是同化的重要過程之一（Gordon, 1964）。影響華裔族群保持華裔認同的客觀因素大致為華文教育、族語使用、略知中國史地、與華人交往等因素（陳烈甫，1983：13；周勝皋，1961）。

「華僑」是指中國人移居或僑住外國領域且未喪失中國國籍者（楊建成，1985：2；1984）。這些華僑通常是因為經商而短暫停留在外國。華僑移居國外若年代久遠且經過土著化過程，就形成華裔或華人。「華人」為清末以來逐漸普遍的用語，泛指祖先多少具有中國血統，但不論其國籍為何者。華裔與華人的主要差別在於土著化程度及該族群在當地國是否成為主體民族。一般來講，華裔通常指已經某種程度的土著化，且族群人口分散或僅佔當地人口極少比例者。譬如，華裔美國人。如果華裔人口分布集中或佔當地多數，就有可能稱為華人或以新名詞出現。譬如新加坡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及越南華人（*người Hoa*¹⁰）等。以新名詞出現的例，如馬來西亞的 *Baba Nyonya*（華人與馬來人通婚之後代）、越南明鄉人、台灣的台灣人等。儘管這些用詞用語有相對客觀的區分標準，但影響族群認同最重要的還是當事人主觀的自我認同。

「中國」這個政治名稱是近代 20 世紀起才開始普遍使用。目前「中國」

⁹ 三尾裕子（2006）也有類似的看法。

¹⁰ 在越南語裡，華人稱為 *người Hoa*，當代中國人稱為 *người Trung Quốc*，較早之前也用 *người Trung Hoa*（中華人）稱中國人。

通常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轄內之疆域。中國人則常指政治上具中國國籍的人。其實，早期中國在不同時期與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稱呼。大唐時期，大唐國民南渡到東南亞經商者不少。因而東南亞各地常稱中國為「唐山」、中國人為「唐人」（陳烈甫，1983：92-93）。譬如，筆者於 2011 年 8 月至馬來西亞檳城進行田調時，當地福建裔華人仍使用「唐山」（Tn̂g-soaⁿ）、「唐人」（Tn̂g-lâng）用語。

在台灣，早期也分用「唐山」（Tn̂g-soaⁿ）稱呼中國，用「唐山人」（Tn̂g-soaⁿ-lâng）或「唐山客」（Tn̂g-soaⁿ-kheh）稱呼中國人（王育德，1993：96；甘為霖，1978：707；麥都思，1832：661；杜嘉德，1873：510；小川尙義，1931：395）。譬如台語諺語裡說「有唐山公，無唐山媽¹¹」，直譯為「有來自唐山的男性祖先，但沒有來自唐山的女性祖先」，意指「當時的唐山移民多數為男性，他們後來也多數娶了台灣當地的女性為妻」。這句諺語說明了明鄭時期及滿清統治台灣初期，從中國移民到台灣的明人通常與台灣本地原住民通婚而逐漸土著化的現象。「唐山人」一詞原本可以是「自稱」也可以是「他稱」，但隨著土著化過程的進行及本地意識的高漲，唐山人逐漸成為他稱，形成「唐山（中國）和本地（台灣）的地域性和社會性的對立抗爭」（史明，1980：198）。這種唐山（中國）和本地（台灣）的區分在 19 世紀末已被鞏固化和擴大化（史明，1980：198）。以台語諺語：「唐山客對半說¹²」（意指來自中國大陸的行商漫天開價，必須打對折）為例，清末時期的台灣人已自認為台灣本地人，唐山客或唐山人則用來稱呼那些來自中國的商人（王育德，1993：96）。進入 20 世紀以後，一方面是土著化的關係，另一方面是日本統治期間促成近代化與資本主義化，促使台灣社會與台灣人意識的形成（史明，1992：220）。意即這時期起「台灣人」一詞已廣泛取代「唐山人」一詞，成為台灣人自稱的主流。

目前台灣普遍以「漢人」一詞來描述當時從中國移民來台的人。「漢人」原本是指漢朝的人民（麥都思，1832：208；杜嘉德，1873：118）。

¹¹ 台語白話字 Ū Tn̂g-soaⁿ-kong, bô Tn̂g-soaⁿ-má。

¹² 台語白話字 Tn̂g-soaⁿ-kheh tùi-pòⁿ soeh。

這個詞彙在台灣被普遍使用與中華民國來台有關。中華民國開國之初強調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漢人」一詞被用來做為國家內部族群名稱之稱呼，而「華人」則因應「中華」概念的產生，成了外界及移居海外的中華民國人的新稱呼。

繼「唐人」之後，大明時期的居民亦被稱為「明人」，大清時期則稱為「清人」。這些用詞在越南國史裡常有所見。譬如，1840年《大南寔錄》正編第二紀卷208裡記載（許文堂、謝奇懿，2000：210）：

戶部奏言嘉定別納各戶有唐人屯田四耨二百三十六人歲納稅錢人各六緡老疾半之且彼等本自清國投來雖不與清人同幫而稅例豈應有異惟據所著貫址均在南圻各省社村不知是原清人而冒著抑或我民而冒從唐人簿額求免兵徭請令省臣察覈何人確是我民貫南圻各省者抽回受差如有見成家產願附籍于所寓者亦聽其餘清人插入屬省各幫照從明鄉例征稅有物力者銀二兩無物力者銀一兩。

本論文在論文書寫過程中，有時為明確反應某特殊時空情境下的稱呼而分別採用明人、清人、明鄉人、華人、華僑、中國人等不同用語。

各時期從中國移民到越南的明人／清人／華人均會建立或依既有的「會館」為活動中心。這些會館通常會祭祀神明或祖先，且為重要的社群網絡聯繫中心。這些會館可分為二大類：第一類為明鄉人主導的俗稱明鄉會館的會館。譬如，胡志明市的「明鄉嘉盛堂¹³」、邊和市的「新鄰亭¹⁴」及會安市的「明鄉萃先堂¹⁵」。明鄉嘉盛堂源自新鄰亭，且同處越南南部，故雙邊的成員仍互動頻繁。至於明鄉萃先堂因位於越南中部，與南部的嘉盛堂與新鄰亭已無往來。在作者訪談當中，萃先堂的幹部甚至認為嘉盛堂與新鄰亭是華人在主導而非明鄉人。這是頗特殊的現象！

會館的第二類為華人主導的五幫會館。這些會館依照原屬族群（幫）籍貫而劃分地盤，譬如，福建會館、廣肇會館（廣東幫）、潮州會館、瓊府會館（海南幫）及客家會館等。即使來自同一省分，也會依語言／城市

¹³ 越南文 Hội Đình Minh Hương Gia Thạnh。

¹⁴ 越南文 Đình Tân Lâm。

¹⁵ 越南文 Minh Hương Tuy Tiên Đường。

差細分地盤。譬如胡志明市的「霞漳會館」(漳州)及「溫陵會館」(泉州)等。這些五幫會館均由華人主導，各館互相之間目前仍有往來，譬如互贈牌匾等。但在當代，這些會館與明鄉會館已無往來。過去是否有往來則不可而知。經訪查，其原因大致為：第一，語言因素。華人多數仍使用自己的族群母語，但明鄉人已使用越南語。雖然多數華人均通曉越南語，但畢竟母語的情感不同。第二，族群文化認同差異。明鄉人均認同自己是越南人，對越南有較深的土地情感且已建立在地化的社會網絡。對明鄉人而言，中國的祖籍地只是歷史上的過去記憶，已無實質上的人際網絡上聯繫的需要。第三，經濟因素。依據受訪人 A 及 B 表示，1975 年越南解放後明鄉人的經濟狀況大幅衰退。相形之下，在 1990 年代越中關係改善以後，在越華人的經濟狀況隨著越南的開放而逐漸富裕。由於經濟上的不對等，也促使明鄉人及華人之間少有聯繫。

參、明人到落地生根的明鄉人

中國與東南亞之交流大約奠基於漢、唐時代。之後，在宋、元、明、清及 20 世紀時期均有中國人因做生意或戰亂等因素而陸續移居到東南亞(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78；吳鳳斌，1994)。東南亞各國中，越南因與中國陸地相連，且於漢唐時期曾受中國直接統治，故很早即成為中國人經商與移居的國家之一(Trần Trọng Kim, 1921；郭振鐸、張笑梅，2001)。

雖然中國人很早就有遷徙到越南的紀錄，然而因年代久遠或因人數有限，這些早期移民早已融入越南社會文化之中而難以辨識。目前，尚可藉由文獻或文化表徵來辨認的華裔後代幾乎都是從大明帝國時期以來陸續遷徙到越南的移民。

公元 1405 年，大明帝國永樂 3 年，「鄭和」帶領二萬八千餘人開啓七下西洋的歷史。鄭和的首站「占城¹⁶」即位於現在越南中部(華僑志編纂委

¹⁶ 占城為占族人建立的東南亞文明古國，位置大約位於現在越南中部大部分土地。占城於 17 世紀末為越南阮氏政權所滅，其地變成現在越南中部各省(陳重金，1992：240)。

員會 1958)。1492 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代表歐洲人第一次航行到美洲大陸；幾年後，葡萄牙的航海人「達伽碼」(Vasco da Gama)於 1498 年經由「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開啓歐洲到印度的新航線。15 世紀的結束剛好是新航線、大航海時代的開始。在亞洲，隨著新航線時代腳步而來的是國際貿易、西歐的傳教活動和殖民主義。

自 16 世紀中葉到 18 世紀末，當時越南正屬南北分裂、鄭阮紛爭時期。北方的鄭氏政權（或謂「鄭主」Chúa Trịnh）以「舖憲」（Phố Hiến）一地為主，南方的阮氏政權（或謂「阮主」Chúa Nguyễn）則以「會安」（Hội An）從事國際貿易。越南中部的海港會安在占城時期即為東南亞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之一。這些商人包含來自葡萄牙、大明帝國、日本、台灣、荷蘭等地（Trương Hữu Quỳnh 等，2006：371；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32；湯錦台，2005：179-80；Wheeler, 2003；譚志詞，2005）。當時的明人多數乘冬季東北季風南下到會安，再利用夏季吹西南季風時回國，因而也被當地越南人稱為 người Tàu（越南喃字寫為「人艚」），意指「坐船來的人」。

早期會安的大明商人聚集的地方稱為「大明客庸」，後來也稱「大唐街」，均屬於臨時性之僑居地（陳荆和，1965）。當大明帝國亡國之後，越來越多的明人為避戰亂或因不願臣服滿清而遷徙到會安。當時北方的鄭主雖不拒絕明人入境，但採嚴格的入籍同化政策以避免滿清藉故干涉。相形之下，阮主的廣南國離滿清較遠，較無清軍入侵的壓力。因此阮主採取歡迎的態度，以期利用明人的資源以對抗鄭主及促進南疆之開拓（陳荆和，1965；1960；1968）。阮主給予這些擬在越南落地生根的明人特典，亦即設立特別的村社組織，稱為「明香社」（Minh Hương xã）。「明香」之原義為「維持明朝香火」。明香社的男性大多數為明人或明越混血，而女性則多為當地越南人（陳荆和，1965）。這種情形類似二次大戰後蔣介石從中國帶百萬軍眷到台灣一般，多數未婚男性軍人與台灣當地女性通婚。根據陳荆和（1965）及三尾裕子（2008：6）的研究，大約 1650 年左右聚集在會安的明人開始建立明香社。當時會安的明人約有五千人之多（湯錦台，2005：180）。其中，據 Wheeler（2003）指出，有 170 餘名鄭成功舊屬從台灣流亡到會安海關任職。

明鄭遺將楊彥迪與陳上川等人於 1679 年率眾投靠擁有會安的阮氏政權後，阮主授予官職並負責開墾南方，包含現今越南南部的「嘉定」、「定祥」、「邊和」等地。此外，流亡到柬埔寨且開墾「河仙」一帶有成的「鄭玖」於 18 世紀初也投靠阮主。河仙一帶後來成為越南南部的河仙省。楊彥迪、陳上川與鄭玖等這些人均成為越南南部明鄉人的始祖（Đặng Thanh Nhàn, 2010: 8）。

公元 1802 年阮世祖統一越南，以越南中部「順化」為首都，建立越南最後的王朝「阮朝」。阮世祖於 1807 年下令在全國設立明香社以管理明人後裔並編入戶籍。至阮聖祖即位後，於 1827 年起將「明香」改為「明鄉」，視明鄉人為已入籍的越南人（陳荆和，1965：1；藤原利一郎，1976：260）。由於明鄉人的權益優於清國裔人，故清國時期才移居來越南的清人，與越南女子通婚後其後代亦多自認為明鄉人（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41；三尾裕子，2008：10）。因此明鄉人不再只是明朝香火之原義，而泛指華越通婚的後代子孫。

究竟現在還有多少人明鄉人？其族群文化認同為何？若依據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43）轉述南洋年鑑的記載，「明鄉華僑以南越為最多，其人數在 1921 年為 64,500 人，1931 年增為 73,000 人」。但，文中的「明鄉華僑」究竟是明鄉人還是華僑？因未交代清楚，故不得而知。早期法屬時期或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所做之華僑人口調查，主要係針對「華僑」而非明鄉人（楊建成，1984：92）。此外，由於年代已久遠，且目前越南身分證上並沒有明鄉人的民族選項，故恐怕難以估計。依筆者走訪胡志明市、邊和市及會安的明鄉會館所做的調查，若以當代仍有出入各地明鄉會館且自認為明鄉人者來推估，可能只有數百人或最多上千人而已。

肆、當代越南化的明鄉人

上節所述為歷史上的明鄉人，至於當今的明鄉人及其後代的情形為何？本節將針對胡志明市的「明鄉嘉盛堂」、邊和市的「新鄰亭」及會安的「明鄉萃先堂」所做的田調重點摘錄於下¹⁷。

胡志明市的「明鄉嘉盛堂」，又稱為「明鄉會館」、「明鄉嘉盛會館」或「嘉盛堂」，位於胡志明市第五郡陳興道路 380 號¹⁸。根據嘉盛堂入口處的碑文介紹，明鄉嘉盛堂於 1789 年由 81 位明鄉人共同創立，以紀念陳上川（Trần Thương Xuyên）、鄭懷德（Trịnh Hoài Đức, 1765-1825）、阮有鏡（Nguyễn Hữu Cảnh, 1650-1700）及吳仁靜（Ngô Nhân Tĩnh, 1761-1813）等人。這四人當中，除了阮有鏡以外，其餘均為明鄉人後代。依據受訪人 A 及 B 的意見，越南南部早期普遍使用「Ba Tàu」稱呼明鄉人或華人則源自於此：Ba Tàu 指陳上川、鄭懷德及吳仁靜三人。「Ba」在越南語裡指數字「三」，「Tàu」原意為「船」，延伸指來自中國的人。

明鄉嘉盛堂分為正殿與後殿。正殿中央祭祀明末皇帝（牌位上寫「龍飛」二字）、「五土尊神」、「五穀尊神」、「東廚司令」及「本境城隍」。依據嘉盛堂介紹手冊內的介紹，「龍飛」為明末皇帝的年號（Đặng Thanh Nhàn, 2010: 17）。事實上，明朝並無龍飛的年號。「龍飛」應為明鄉人自

¹⁷ 除了上述三個明鄉會館之外，胡志明市還現存有三個明鄉會館：分別為福安會館、義潤會館及富義會館。福安會館（Phước An Hội Quán）目前也稱關帝廟，位址在 184 Hồng bàng, Phường 12, Quận 5, TPHCM. 福安會館的入口處、碑文及匾額上仍殘留「明鄉」及「Chùa Minh Hương」字樣。雖從建物遺跡可看出福安會館為明鄉人的會館，但經實地訪查，該館目前主要為華人（主要為廣東幫）在經營與祭拜。透過與明鄉嘉盛堂的報導人 D 的訪談，D 認為福安會館為華人的會館而非明鄉會館。依此推測，福安會館過去可能曾經是明鄉人聚集的會館，後來才轉為以祭拜關公（主要）及媽祖（其次）為主的華人在經營。義潤會館（Hội Quán/Định Nghĩa Nhuận）位址在 27 Đường Phan Văn Khỏe, Phường 13, Quận 5, TPHCM. 依據報導人 D 的看法，義潤會館為明鄉人的會館，但經實地訪查發現，該會館目前主要祭拜關聖帝君、天后聖母及本境城隍，來參拜者有華人及越南人。該會館的建物及匾額並未留下明鄉的字樣，僅部分匾額仍存有「龍飛」年號。富義會館（Phú Nghĩa Hội Quán）位址在 16 Đường Phú Định, Phường 11, Quận 5, TPHCM. 部分匾額仍存有「龍飛」年號。

¹⁸ 越南文 380 Đường Trần Hưng Đạo, Phường 11, Quận 5, TPHCM。

創、虛擬、象徵性的明朝皇帝年號。其初期用意可能為避免直接使用明朝皇帝年號以免公開得罪當時的大清皇帝及收留明鄉人的越南阮朝皇帝。由於年久失傳，明鄉人後代就誤以為龍飛為明末皇帝的真實年號。

正殿右側（面向門外）祭祀鄭懷德與吳仁靜。左側（面向門外）祭祀陳上川及阮有鏡，其神位兩側並有對聯如下：

恥作北朝臣綱常鄭重
寧為南國客竹帛昭垂

該對聯似可表明陳上川等早期明鄉人之反清心態。

正殿上方亦懸掛不少不同時期的牌匾。依據報導人 C 表示，其中的「敦本睦鄰」及「正氣長存」分別為蔣介石及陳誠於 1960 年代致贈給嘉盛堂。該牌匾上原刻有蔣介石及陳誠的名字，但 1975 年南北越統一後為避免政治上的敏感問題而主動去除其名字。

明鄉嘉盛堂後殿主要祭拜三繼賢及歷年對經營嘉盛堂有功的幹部。三繼賢是指王光珍、柯文麟與康成源三位於 1924 年協助出錢出力重建嘉盛堂有功的人士。在正殿通往後殿的通道上存放著早期明鄉人穿過的鞋子與帽子。此外，據報導人 A 表示，解放（1975）前該通道上的神桌上曾供奉鄭成功的神位。

明鄉嘉盛堂的成員須為明鄉人（從父系）後代才能加入。組織上，由自治的管理委員會管理。管理委員會（Ban Quản trị）約三年改選一次，一般成員（穿黑色禮服）約當過三年的幹部才能被選為鄉長（Hương trưởng），須當過鄉長（穿藍色禮服）的成員才能被選為管理委員會委員（Ủy viên），至少當過三年委員才能晉升為視事鄉長（Hương trưởng thị sự）。當過視事鄉長且年齡至少四十五歲以上才能被推舉為正主（Chánh chủ）。「正主」為組織中最高的職位，正主共有三位：一位負責對外業務，一位負責對內業務，一位負責擔任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Trưởng ban）。

目前，明鄉嘉盛堂係屬民間私人團體經營。該堂於 1993 年 1 月 7 日獲越南文化通訊部公認為歷史文化遺蹟。依據受訪人 A 及 B 表示，營運經費主要由其明鄉成員及來訪賓客自由奉獻。越南政府雖有公認嘉盛堂為歷史

文化遺蹟，但並沒有提供經費援助。依據受訪人 A 及 B 表示，明鄉會館是明鄉人重要的集會所，每逢過年過節均有集會活動以凝聚明鄉人的意識。在解放之前，胡志明市的濱邊府路上有許多明鄉人的會館，每逢過年過節均會辦桌宴客並發紅包、獎學金或敬老金給明鄉成員。解放後，當時的政府對明鄉會館並沒有太多善意，甚至不少明鄉人被清算鬥爭，因而許多明鄉人四處逃難或隱密身分。這種緊張關係直至 1990 年代越中關係改善後才隨之改善。依據受訪人 A 及 B 表示，解放前常來明鄉嘉盛堂的成員約有二、三百人之多，但當今的人數已急遽下降。依筆者於 2013 年春節聚會活動觀察到的人數為例，僅剩數十人參加而已。

在禮俗方面，除少部分外，明鄉人大致依照越南京族人的習俗。依據受訪人 A 及 B 表示，該堂明鄉成員於結婚前二日須回到嘉盛堂祭拜。有新生兒出生時家屬須通報會館¹⁹。新生兒滿月時會請客，但不做四月及週歲禮。年老去世時，其喪禮依照越南京族儀式。唯一不同處是送終時須到明鄉會館向祖先道別，由會館指派幹部二人代表回禮（京族是由家屬回禮）。祭祀時穿戴的禮帽（*Khăn xếp*）具有九層（意指「長久」），與越南京族的三層稍微不同。明鄉人與京族人一樣於過年前接祖先回來過年，但京族人農曆初三就送祖先回去，明鄉人初六才送走祖先。至於清明節，明鄉人不過清明節，但當代華人則保留。雖然受訪的明鄉人表示不再過清明節，且根據嘉盛堂壁上所刻的年度祭祀活動日也沒記載清明節，但嘉盛堂最新版介紹手冊內容卻新增清明節活動（*Đặng, 2010*）。

至於語言方面，明鄉人基本上使用越語，不懂漢字與漢語。筆者於 2011 年 8 月 10 日（農曆 7 月 11 日）前訪越南胡志明市的「明鄉嘉盛堂」。那時剛好舉行「三繼賢祭祀」（*cúng Tam Kế Hiền*），與會明鄉人約十餘人，全程以越南語進行。他們均不懂華語或各幫語言（譬如福建話或廣東話），漢字頂多僅認識幾個字（譬如自己的姓名）。之後幾次針對不同明鄉人的訪問，也大致得到相同的答案。以受訪人 A、B（二人均大約 50 歲）及 D（56 歲）為例，他們的阿公那一代還會講廣東話／福建話與法語（因法國

¹⁹ 目前每年約 2-4 位新生兒來報到。

殖民時期)，但下一代之後廣東話／福建話就失傳，完全使用越語。另一位 1926 年出生的受訪人表示，祖先於 17 世紀末來自中國廣東，他本身會越語、法語、英語及一些簡單的廣東話，子女則不會廣東話。這是唯一一位受訪人表示還會一些簡單廣東話。依此推測，明鄉人的父輩族語（廣東話或福建話等）大約到 20 世紀初期左右已開始明顯大幅度失傳。

表 1：胡志明市明鄉嘉盛堂年度祭祀活動

日期（農曆）	祭 祀 活 動	越 文 原 文
01 月 07 日	春首祭	Cúng Xuân Thù
01 月 16 日	求安節祭祀	Cúng Kỳ Yên
03 月份	清明節祭祀*	Cúng Thanh Minh
03 月 19 日	天后靈魂的祭祀	Cúng Vía Bà
05 月 05 日	端午節祭祀	Cúng Đoan Ngọ
06 月 29 日	祭拜 Trờ ng Công Sĩ	Cúng Ông Trờ ng Công Sĩ
07 月 11 日	三繼賢祭祀	Cúng Tam Kế Hiền
07 月 16 日	張夫人祭祀（杜氏祭祀）	Cúng Bà Trờ ng (Đỗ Thị)
08 月 15 日	中秋節	Lễ Trung Thu
10 月 01 日	紀念吳仁靜開墓	Cúng kỉ niệm ngày bốc mộ Ông Ngô Nhân Tĩnh
10 月 16 日	謝神祭祀	Cúng Tạ Thần
12 月 22 日	冬至祭祀	Cúng Đông Chí
12 月 16 日	祭拜 Tạ Tinh	Cúng Tạ Tinh
12 月 24 日	送神祭祀	Cúng Đưa Thần
12 月 25 日	掃墓祭祀	Cúng Tảo Mộ
12 月 28 日	迎祖先祭祀	Cúng Rước Ông Bà
12 月 30 日 (晚上 7 點)	迎神祭祀	Cúng Nghinh Thần

*近年新增，謹記載 3 月份，無指定日期。

另外，報導人 D（女性，1957 年生）亦提供一份家傳殘缺的手抄族譜給作者（見附錄 1）。透過該族譜，亦可從不同面向瞭解明鄉人。該份族譜

的抄寫者 E 與 D 的阿公為堂兄弟關係，亦即 E 為 D 的叔公。茲摘要該族譜之重點如下：

第一，該份族譜由越南羅馬字及漢字雙文字的方式呈現。人名及地名則偶有喃字（chữ Nôm）出現。譬如在越南出生的第四代祖先名字「Hai」（數字“二”的意思，因排行老二）用喃字寫成「𠵼」。越南羅馬字的表記以越南語發音為準，但也有發現少部分的例外。譬如，第五代女性祖先名字「花」用越式羅馬字記為「Huê」，該發音與台語／福建話的「Hoe」一致²⁰。該詞可能是延續前人的福建話用語而來。此外，漢字的越南語發音以文言音為主，但也有發現同一漢字在不同地方分別記文言音與白話音。譬如，「蓮」在不同人裡分別用「liên」（文言音）與「sen」。

第二，該份族譜從抵越第一代紀錄到第六代（報導人 D 那一代），之後因家族無人懂漢字而中斷。族譜的一開始是族譜圖，之後為主文逐一依照輩分介紹。族譜裡男女均收錄。族譜圖的輩分長幼由右而左區分，且依照越南人的稱呼習慣僅記名字的最後一字。男性在名字上加雙圈記號，女性在名字上加單圈記號，不知性別者則未加記號。主文裡主要記載各代親屬姓名（全名記載）、卒年（不記出生年）、子女名字及主要事業。部分內容僅記錄人名，其餘資料則無。年代則採計中國（早期用大清，之後用中華民國）年號及越南年號雙重紀錄。從族譜裡出現的人名可發現，名字並未完全依照中國慣用的字輩來分輩份取名。此外，各代男性娶的妻子全部為越南人或明鄉人後代，並沒有發現回去中國娶妻的現象。

第三，來越第一代始祖被成為「高祖公」。依族譜記載，高祖公於大清康熙年間（1662-1723 年）從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培田鄉來到越南。由於未精確記載抵越年代，故無法得知是否為追隨陳上川來越的第一批移民。族譜的抄寫者 E 亦未紀錄自己的出生卒年及族譜抄錄時間。依據族譜，E 的父親出生於大清道光 24 年 9 月 26 日（公元 1844 年 11 月 6 日），卒於中華民國 2 年（1913 年），生有一女四男，E 為其么子。E 的阿媽為名人鄭懷德之女兒。由於 E 懂漢字、越南羅馬字及法文（是否懂福建話或廣東

²⁰ Hoe 為台灣及福建流行使用的傳統白話字的表記方式。

話則報導人未知曉)，故應當受過法國統治時期的教育²¹。由此推估，E 最遲應於 19 世紀末出生。從這點看來，在 19 世紀末之前的明鄉人仍有使用漢字，但懂漢字的人數比例應該不高，否則不會經過一二代時間即造成族譜書寫中斷的現象。

除了胡志明市的嘉盛堂，位於當今同奈省邊和市和平坊的新鄰亭²²亦為重要的明鄉會館之一。依據新鄰亭內部流通的手冊的記載，原始新鄰亭是在喇叭城(Thành Kèn)的一座小廟。在越南明命帝(Minh Mạng, 1820-40)時期，附近的人民立這座廟以表示對陳上川將軍開墾同奈—嘉定地區荒地有功的尊敬。經過兩次遷移以後(1861, 1906)才遷到目前的位置。由於陳上川對於開拓越南南方疆域有功，越南明命、紹治、嗣德等皇帝都封他為「上等臣」(Thượng Đẳng Thần)。由於新鄰亭具有歷史文化意義與價值，於 1991 年獲越南文化資訊和體育旅遊部認可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古蹟。

嘉盛堂及新鄰亭均位於越南南部地區。越南中部的會安也有重要的明鄉會館，分別為「明鄉萃先堂²³」及「文聖廟²⁴」。明鄉萃先堂目前已修復完成並開放觀光，為會安古街的景點之一。但文聖廟則目前尚未開放參觀，猶待整修當中。

萃先堂主要祭拜明鄉人祖先(開創的「十大老」、「三大家」及歷年明鄉社幹部)，而不祭拜神明。於 1993 年獲越南政府認可為歷史文化古蹟，並於 2002 年至 2009 年間接受越南政府補助重新整修。依據報導人 F(祖籍福建泉州，來越第 10 代，完全不懂漢字)的說法，以萃先堂為聯繫中心的明鄉人於 1945 年戰後曾蕭寂半個世紀，直到 2009 年整修完畢開放參觀後才在政府主動動員下找回現有的明鄉人擔任會館的自治管理工作。由於

²¹ 公元 1858 年，法國利用傳教士受迫害做藉口聯合西班牙軍艦向越南中部的岬港(Đà Nẵng)出兵(Trần, 1921: 516-17)。越南末代朝廷「阮朝」打不過法軍，為求和只好於 1862 年簽訂「第一次西貢條約」割讓南部「嘉定」、「邊和」、「kap「定祥」三省給法國(Trần, 1921: 523)。

²² 越文為 Đình Tân Lân。地址為 đường Nguyễn Văn Trị, phường Hoà Bình, thành phố Biên Hoà, tỉnh Đồng Nai。

²³ 位於會安古街陳富路(Trần Phú)14 號。

²⁴ 位於陳富路隔壁的潘周楨(Phan Châu Trinh)路上。

長達半世紀的失聯，目前成員人數不如以往之多，現今仍有來往者大約幾百人左右。由於過去長期沒有活動，在訪談過程中明鄉報導人對明鄉人的歷史記憶幾乎都是從近年出版的書籍資料從新擷取、建構而來。

萃先堂的最早建立的具體年代暫不清楚。依據萃先堂門口的正式介紹文來看，萃先堂約建立於 18 世紀末期。依據三尾裕子（2008：9）的研究，萃先堂建立年代應當在「明香社」正式改為「明鄉社」之際的 1827 年左右。由於明鄉人可以享有較華僑優惠的稅率，且免除一般越南人需服兵役與勞役的義務，故從先前的中華會館及福建會館（約 1690 年代建立）獨立出來建館有其保有明鄉人獨特身分的好處。

在萃先堂拜訪期間，報導人 G（祖籍福建泉州，來越第 11 代，完全不懂漢字）提供了一份家藏的土地移轉契約。該契約用漢字書寫，最初訂立時間為越南嘉隆帝 9 年（Gia Long, 1810），中途移轉兩次，分別為嘉隆 10 年及 16 年（1817）。在這段期間契約均用「明香社」一詞。到了最後贖回時為成泰 16 年（1904），此時已改用「明鄉社」用詞。此契約剛好可看出「明香社」轉換為「明鄉社」的過程。

由上述諸多方面看來，即便部分明鄉人仍盡力保有明鄉人族群意識，整體而言，明鄉人已經完全本土化融入越南主體社會。

伍、明鄉人以外的新近華人移民

除了有明人移居越南之外，滿清統治中國的 18 至 19 世紀期間，也陸續有清人到越南經商或定居。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人口與土地壓力劇增（吳鳳斌，1994：228-34）。在滿清平定反清勢力後，人民獲得休養生息。隨著人口倍增，耕作土地不足，於是促使人民向外發展。儘管滿清初期曾陸續採取海禁政策，但仍有不少人寧可違反禁令冒險向外發展。至鴉片戰爭後清國逐步取消禁令，人民得以自由到海外經商或做工。

第二，戰亂與政局變動。譬如，公元 1788 年越南西山王朝的阮惠擊敗入侵的清國 20 萬大軍（Trần Trọng Kim, 1921: 395）。戰後，許多清兵戰俘

滯留在越南。又如，19 世紀中葉，清國發生太平天國革命動亂，不少餘黨避入越南北部地區（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35）。此外，清末民初時期，不少革命黨人也經常出入越南。譬如，孫文於 1900 至 1908 年間曾六次停留在越南（Chuong Thâu, 2011；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36）。

自革命黨人推翻滿清於 1912 年建立中華民國以來，中國內亂四起。加上 1937 年以後日本侵略中國，均造成越南的華僑人數遽增。依《華僑之研究》轉載法屬越南年鑑統計資料，1889 年僅有 56,528 人，1906 年有 12 萬人，1934 年則有 32 萬 6 千人（楊建成，1984：92）。至二次大戰後，依陳烈甫（1983：327）引用之資料，法國殖民政府於 1948 年公布的華僑數目約 70 萬（南越有 63 萬，其餘在北越），中國僑委會公布的數字是 100 萬。其數字差異主要是僑委會採父系血緣主義且承認雙重國籍。

公元 1954 年越南以北緯 17 度分為南北而治。北方為「越南民主共和國」，南方為「越南共和國」。分裂之局面到 1975 年才由北方政權統一全國。在 1954 年至 1986 年越南改革開放前這一段 30 餘年期間，導因於經濟及政治問題，越南政府對華僑採取積極同化及排華的政策（黃宗鼎，2006）。

在同化政策方面，主要有強迫入越南國籍及限制僑辦中學（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213-16；陳烈甫，1983：324-25）。譬如，南越政府於 1956 年修改國籍法，規定「在越南出生，其父母為中國人子女，一律為越南籍」。學校授課時，華語視為外國語。當時僑界對此越化政策相當反感，認為是歧視華僑的措施（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214）。越南政府則認為是一種優惠。雙方認知差異極大。

排華政策包含限制營業項目及驅逐出境。由於華僑在越南掌握經濟命脈，因而越南政府採取限定華僑不得經營某些行業（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215-16）。此舉亦造成華僑相當大的反彈。在 1979 年爆發越中武裝衝突前，越南政府對中國政府已累積相當大之怨氣，故對那些不願加入越南國籍的華僑採取強烈的驅逐出境政策。據估計，在爆發中越戰爭前已有約 20 萬華僑離開越南（黃宗鼎，2006：147）。

自 1986 年越南改革開放以來已過 20 多年。激烈的排華政策已趨於和緩。華僑、台商、越僑等都陸續回到或來到越南從事經貿活動。目前，除

了偶發事件，譬如中國情報人員潛藏在西原礦區活動，或「南海」（越南稱「東海」）主權等會引發外交爭議外，越南民間幾無排華心態。但 30 多年前激烈排華的印象或許還停留在越南華人印象中。依據筆者於 2011 年 8 月訪問過的南北 23 位華人當中，有 3 位對於訪問到華人議題時仍不太願意公開受訪。

從中國移居到越南的“華人”（或所謂廣義的漢人）在越南的民族認定上被正式分為華族（Hoa）、Ngái（客家）與 Sán Dìu 三族。華族其實是複數族群的綜合體，主要包含來自中國講廣東話、福建話、潮州話、海南島、客家話等族群／幫（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51；Trần, 2000: 54-55；Đặng, et al., 2000: 226）。目前越南究竟有多少越南籍的華人？依據越南於 2009 年的人口普查結果，全越南共計有 823,071 位華人（người Hoa，此調查未細分五幫）。據 1936 年統計資料，廣肇籍約佔 50%，福建籍 20%，其餘三幫共約 30%。由於資料久遠且歷經排華階段，故此比例當有很大改變。依據芹澤知広透過胡志明市華人事務部門取得的資料，胡志明市於 1992 年共計有 524,000 名華人（約佔全市八分之一人口），各幫分布比例如下（Serizawa, 2008: 23）：

表 2：胡志明市華人族群分布比例（1992 年）

族 群	百分比
廣 東	56
潮 州	34
福 建	6
海 南	2
客 家	2

早期華人移居到越南時通常依其族群屬性而傳承其自己族群的母語。至 20 世紀初中華民國建立後，由於以北京話為標準的國語運動的推行，這些華人開始接受與學習北京話。筆者於 2011 年 2 月 11 日於越南胡志明市的二府會館訪問到 H 報導人（祖籍福建廈門，父母均廈門人，今年 82 歲，

來到越南為第三代)。楊先生不僅講越南話，尚能講流利的廈門話。由於台語與廈門話相當接近，筆者用台語與 H 報導人溝通時並無語意了解上的困難。H 報導人小時候在廟裡用廈門話讀漢文，除了會族語廈門話之外，讀書時也學北京話。他後來娶了一位廣東籍的太太，因而學會廣東話。他表示，他的語言流利程度分別為越南語、廈門話、廣東話與北京話。他的小孩會越南語及廣東話，但廈門話不太會講。

華族雖然被列為越南 54 個少數民族之一，然而華語（北京話／普通話／漢語）與漢字卻被越南人與越南政府視為“外國語文”。譬如，中文系被列在外語學院，電視及廣播節目的華語教學被當作外語教學節目。可能因為中國將華語及漢字列為官方語文，故越南採取這樣的做法。這種做法值得台灣參考。

客家人在越南北部常稱為 người Ngái²⁵，南部常稱為 người Hẹ。依據 2009 年的越南人口普查結果，Ngái 族共計有 1,035 人，比 1989 年統計的 1,318 人數少了 283 人²⁶。依照越南學者的陳述，Ngái 又稱為 Hắc Cá, Sán Ngải, Xín, Lô, Đản, Hẹ, Xuyên, Ngái Lâu Mần 等不同名稱（Viện Ngôn Ngữ Học, 2002；Trần, 2000；Đặng, et al., 2000；Bùi, 2004）。依據本人於 2012 年 11 月到越南北部北江省的 Ngái 族村莊所做的初步調查，該村 Ngái 人講的客語大約有一半不一樣²⁷。由於 Ngái 從不同時期進入越南，且其分散在越南北中南各地所遇到的鄰近族群亦不盡相同，可能因此而有不同的族群稱呼。究竟 Ngái 是否講單一的客語，或是不同的客語方言，甚至是不同語言？其語言活力為何？人口的減少是因為族群認同的轉變（從 Ngái 族到 Hoa 族）或越化的結果？由於越南學者對 Ngái 族語言調查幾近於零，進一步的田野調查有待進行（Trần, 2000: 114）。近年，台灣的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生吳靜宜（2010）曾到越南胡志明市做客家族群及客語研究。雖未能針對越南的客語做全面系統性調查，但因 Ngái 族研究相當缺乏，該論文仍不失其足資參考的價值。

²⁵ 越南人聽 Ngái 人講話經常聽到“Ngái”（「我」的意思），故稱其為 Ngái 族。

²⁶ 1989 年統計數字根據 Trần（2000: 114）。

²⁷ 越南文 xã Tân Quang, huyện Lục Ngạn, tp. Bắc Giang。

依據吳靜宜（2010：137）的調查發現，該地客語受廣東話及潮州話影響不少。胡志明市的客語因內部有方言差，故沒有形成優勢腔，亦即沒有一個主流的客語標準做為所有客家人的共通語（*lingua franca*）。在華人社區互動中，客家人反而多使用較強勢的廣東話，客語不僅退到家庭中使用，甚至廣東話也逐漸滲透到家庭領域。

總而言之，依筆者於 2011 年 8 月訪問胡志明市 22 位華人受訪者（包含 5 幫）所做的初步觀察，該地華人大致有幾點現象：

第一，多數華人除了上正規的越語學校之外，還會去上華文小學或中學。他們均可使用不同程度的華語，溝通理解上不成問題。

第二，這些人均可使用不同程度的越語，越年輕者越語越好。老一輩的人結婚對象以華人為多，男性華人通常會娶華人或越南女性，但女性華人傾向內婚為主、較少嫁給越南男性。但年輕一輩的華人外婚、以越南人為嫁娶對象的情形已增多。

第三，這些人的原籍貫母語隨年紀越輕而有衰退的現象。廣東話在當地是越語及華語以外的主要語言。其次為福建、潮州及客家，最後為海南島。這五幫的語言使用者均停留在口語層次，沒有發展白話文書寫系統。

第四，該市的福建話（「閩南話」或「咱人話」）與台語約 95% 可以溝通理解。

第五，受訪者於某種程度上均認為中國為祖國。譬如，受訪者有一位 1932 年在越南出生，來越第三代的祖籍廈門人，仍認為中國是祖國。受訪時有時會用「安南」稱呼越南。

第六，有一位 1930 年出生的受訪者表示，當初小時候隨父母來越南，是為躲避國共內戰時的「拉丁」（受訪者的用語，亦即抓人去當兵）。

第七，曾有受訪者表示當初福建人因經商較多，故較多人於排華期間離開胡志明市。

第八，當地台商多數出入拜媽祖的「霞漳會館」（漳），其次為「二府會館」（漳、泉）。泉州人則出入「溫陵會館」。

第九，當地的「三山會館」並非台灣人印象中的客家會館，而是福州人為主的會館。

第十，「崇正總會」是胡志明市客家人常出入的會所。當地客家人亦自稱「崇正人」。

陸、結語

中國境內的人移居到越南後依其土著化程度可略分三種情形。第一，華僑經商身分，仍維持原有中國籍、中國語言及文化生活模式，有朝一日仍可能回中國。第二，具越南國籍，且被納入越南 54 少數民族之一的華族。第三，完全越南化的明鄉人。

影響明鄉人與華人有不同族群文化意識的主因大致以幾點：

第一，通婚的比例。早期的明人移民因極大多數為男性且人口有限，故大多數外婚、娶當地越南女性為妻。相較之下，當代華人的口有八十餘萬且半數集中在胡志明市。由於外婚的急迫性不如明鄉人，故其華越通婚比例較明鄉人低。

第二，移民時間的長短。明鄉人移居到越南至少都有二、三百年的歷史，其本土化程度較深，對土地認同度也比較高。相形之下，華人大約都是 19 世紀末以後才移民到越南，對中國的歷史記憶猶存，甚至與其祖籍地的親戚仍有聯繫。這也可以說明為何 1945 年以後才移居台灣的中國人多數仍認同中國為祖國。

第三，移民人數占當地人口比例多寡。越南明鄉人僅占越南總人口的極少數（約不到 0.01%），故其本土化路線往越南主體民族——京族靠攏、逐漸越化成越南人。台灣唐山人因占台灣總人口的大多數，雖然唐山人也有融合台灣平埔族文化成分，但終究發展出主體文化並形成「台灣人」的主體意識，並得以保留原有的母語。相較之下，「明鄉人」在越南屬非主流的族群意識，故逐漸同化在越南京族文化之下。至於越南華人，雖然只占全越南人口的 1% 左右，但因其總數達 82 萬人且半數集中在胡志明市，故仍有其群聚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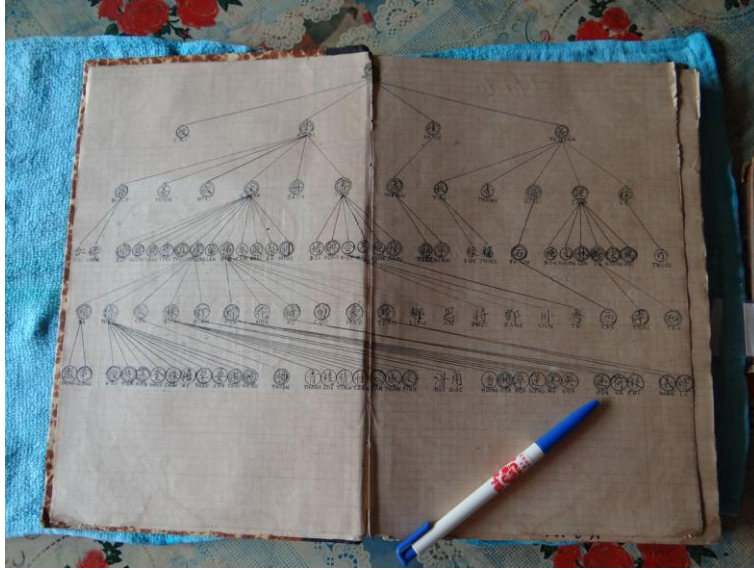
第四，是否保有自己的語言、文化及教育。明鄉人在語言、文化及教育方面可說是完全越南化。目前，明鄉人的意識傳承基本上主要透過家庭

教育。若家中無長輩堅持傳承，相當容易產生斷層。對照之下，華人保有自己的華文學校、報紙及傳統文化節慶。其文化認同傳承較具多元性，而非單靠家庭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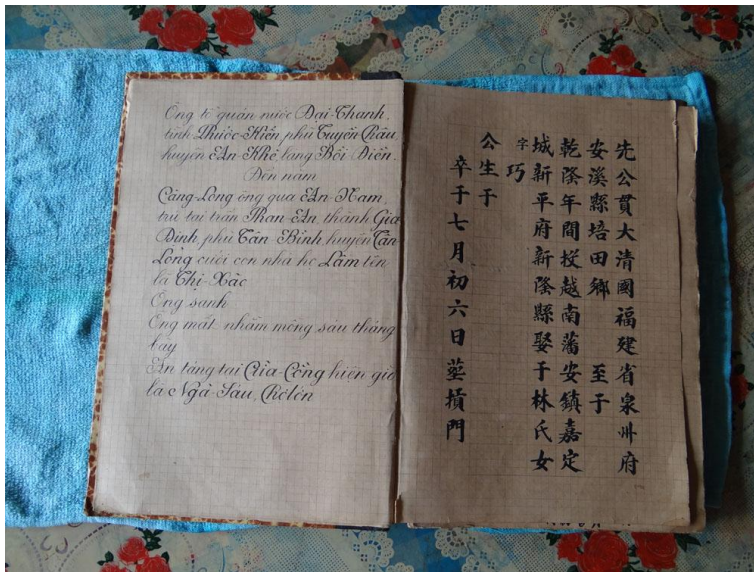
近代越南會引發「排華」運動，越華雙方均有檢討的空間。通常，華人或華僑在越南當地經商有成並對當地經濟活動具有極大影響力。因而，他們在某些程度上以優越的心態對待當地越南人，且積極維持自我族群的華人認同。就當地越南人而言，因感覺經濟被剝削，又由於華人聚集的社區明顯，因此容易成為報復的對象。當越南人以激烈排華方式報復華人，華人則更加仇恨越南人。

其實，歷史上並非沒有華、越合作、創造雙贏的範例。越南明鄉人或許是可以做為典範的成功案例。明鄉人一方面認同祖先來自中國的歷史，一方面也認同並融入落地生根的當地文化。這或許可以成為戰後來台中國人以及東南亞排華運動激烈的國家參考。

附錄 1



明鄉嘉盛堂報導人 D 提供之家族系譜 (蔣為文攝)



明鄉嘉盛堂報導人 D 提供之族譜內頁 (蔣為文攝)

參考書目

- Bùi, Thiết. 2004. *Dân Tộc Việt Nam & Các Tên Gọi Khác* [越南民族及各式稱呼]. Hà Nội: NXB Thanh Niên.
- Chuong, Thâu. 2011. Ảnh hưởng của Tôn Trung Sơn ở Việt Nam [孫中山在越南的影響]. Hội thảo khoa học kỷ niệm 100 năm cách mạng Tân Hợi, 7/15, Hà Nội.
- Đặng, Nghiêm Vạn; Thái Sơn Chu; and Lưu Hùng. 2000. *Ethnic Minorities in Vietnam*. Hà Nội: NXB Thế Giới.
- Đặng, Thanh Nhân (ed.). 2010. Minh Hương Gia Thạnh Di Tích Lịch Sử - Văn Hóa [明鄉嘉盛文化歷史遺跡]. BQT Hội Đình Minh Hương Gia Thạnh.
- Đặng, Văn Thăng. 2007. Người Hoa với Gốm Nam Bộ Việt Nam [Chinese People and South Vietnam Ceramics], in Yuko Mio, ed. *Cultural Encounters between People of Chinese Origin and Local People: Case Studies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pp.57-64. Tokyo: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 Gordon, Milton.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âm, Văn Lang (ed.). 2010. Đình Tân Lâm [新鄰亭]. BQT Đình Tân Lâm.
- Mio, Yuko (三尾裕子), ed. 2007. *Cultural Encounters between People of Chinese Origin and Local People: Case Studies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Tokyo: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 Mio, Yuko (三尾裕子). 2008. “Sojourning and Indigeniz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A Case Study from Hoi An, Vietnam.” 收於三尾裕子（編）《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中国系住民の土著化・クレオール化についての人類学的研究》頁 1-17。東京：東京外国語大学。
- Nakanishi, Yuji (中西裕二). 2008. “Some Aspects of Ong bon (本頭公) in Southern Vietnam.” 收於三尾裕子（編）《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中国系住民の土著化・クレオール化についての人類学的研究》頁 18-21。東京：東京外国語大学。
- Serizawa, Satoshiro (芹澤知広). 2007. The Fujian Chinese and the Buddhist Temples in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in Yuko Mio, ed. *Cultural Encounters between People of Chinese Origin and Local People: Case Studies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pp.65-75. Tokyo: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 Tổng Cục Thống Kê. 2010. Báo cáo kết quả chính thức tổng điều tra dân số và nhà ở 1/4/2009. [2009 年全國人口及住屋總調查報告] (<http://www.gso.gov.vn/default>).

- aspx?tabid=403&idmid=2&ItemID=9782)
- Trần, Hồng Liên. 2007. Hội Nhập và Giao Lưu Văn Hoá của Người Hoa ở Việt Nam (Trên Lĩnh Vực Tin Ngưỡng-Tôn Giáo), in Yuko Mio, ed. *Cultural Encounters between People of Chinese Origin and Local People: Case Studies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pp.87-95. Tokyo: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 Trần, Trí Dối. 2000. *Nghiên Cứu Ngôn Ngữ Các Dân Tộc Thiểu Số Việt Nam* [越南少數民族語言研究]. Hà Nội: NXB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 Trần, Trọng Kim. 1921. *Việt Nam Sử Lược* [越南史略] (2002 再印版). Hà Nội: NXB Văn Hoá Thông Tin. ◦
- Trương, Hữu Quỳnh; Đinh Xuân Lâm & Lê Mậu Hãn. 2006. *Đại Cương Lịch Sử Việt Nam Toàn Tập* [越南歷史大綱全集]. Hà Nội: NXB Giáo Dục.
- Viện Ngôn Ngữ Học. 2002. *Cánh Hướng và Chính Sách Ngôn Ngữ ở Việt Nam* [越南語言情形及語言政策].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 Wheeler, Charles. 2003. "A Maritime Logic to Vietnamese History? Littoral Society in Hoi An's Trading World c.1550-1830."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Seascapes, Littoral Cultures, and Trans-Oceanic Exchanges, Feb 12-15,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三尾裕子 (編), 2008. 《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中国系住民の土著化・クレオール化についての人類学的研究》日本平成 16 年度～平成 19 年度科學研究成果報告書 (課題番号 16251007)。東京：東京外国語大学。
- 三尾裕子, 2006. 〈土着化か、あるいは漢化か? ——「漢族系台湾人」のエスニシティについて〉《中国 21》25 期, 頁 221-30。
- 史明, 1980. 《台灣人四百年史》。San Jose: 蓬島文化公司。
- 史明, 1992. 《民族形成與台灣民族》。作者自印出版。
- 吳靜宜, 2010. 《越南華人遷移史與客家話的使用—以胡志明市為例》碩士論文。中壢: 中央大學。
- 吳鳳斌, 1994. 《東南亞華僑通史》。中國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周勝皋, 1961. 《越南華僑教育》。台北: 華僑出版社。
- 小川尙義, 1931. 《臺日大辭典》(上卷)。台北: 臺灣總督府。
- 李庆新, 2009. 〈越南明香與明香社〉《中國社會歷史評論》10 卷, 頁 205-23。
- 李恩涵, 2003. 《東南亞華人史》。台北: 五南圖書。
- 杜嘉德,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London: 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
- 楊建成 (編), 1984. 《華僑之研究》。台北: 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

- 楊建成（編），1985。《華僑史》。台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
- 湯錦台，2001。《大航海時代的台灣》。台北：果實。
- 湯錦台，2005。《閩南人的海上世紀》。台北：果實。
- 王育德，1993。《台灣苦悶的歷史》。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甘爲霖，1978。《廈門音新字典》（十二版）。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
-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越南華僑志》。台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78。《華僑志總志》（增訂三版）。台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 藤原利一郎，1949。〈廣南王阮氏と華僑：特に阮氏の對華僑方針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0卷5期，頁378-93。
- 藤原利一郎，1951。〈安南阮朝治下の明郷の問題：とくに税例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1卷2期，頁121-27。
- 藤原利一郎，1976。〈明郷の意義及び明郷社の起源〉《東南アジア史の研究》頁257-73。東京：法蔵館。
- 許文堂、謝奇懿編，2000。《大南實錄清越關係史料彙編》（依據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版本精選整理）。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 譚志詞，2005。〈越南會安唐人街與關公廟〉《八桂僑刊》5期，頁44-47。
- 郭振鐸、張笑梅，2001。《越南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鄭瑞明，1976。《清代越南的華僑》。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
- 陳烈甫，1983。《東南亞的華僑、華人与華裔》（修一版）。台北：正中書局。
- 陳荆和，1965。〈關於「明郷」的幾個問題〉《新亞生活雙周刊》8卷12期，頁1-4。
- 陳荆和，1960。〈清初鄭成功殘部之移殖南圻（上）〉《新亞學報》5卷1期，頁433-59。
- 陳荆和，1968。〈清初鄭成功殘部之移殖南圻（下）〉《新亞學報》8卷2期，頁413-85。
- 陳重金（戴可來譯），1992。《越南通史》。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
- 陳錦昌，2004。《鄭成功的台灣時代》。台北：向日葵文化。
- 麥都思，1832。《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s,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Macao: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 黃宗鼎，2006。《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越南之華人政策》。碩士論文。台北：政治大學中山所。
- 黃宣範，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文鶴。
- 黃蘭翔，2013。〈南越華人（明郷人）的定居與會館的興造〉發表於2013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宜蘭：佛光大學。5月31日-6月1日。

Identity and Indigenization: Minh Huong People versus Ethnic Chinese in Vietnam

Wi-vun Taiffao Chiung

*Center for Vietnamese Studie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urvey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indigenization of the Minh Huong People (MHP) and ethnic Chinese in Vietnam.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aw the fall of the Ming Empire in China. After the fall of the Koxinga regime in Taiwan, some former subordinates, such as Dương Ngạn Địch and Trần Thượng Xuyên brought three thousand soldiers to central Vietnam. They were called MHP. Most of them intermarried with the local Vietnamese women. Gradually, MHP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Vietnamese people. Nowadays, MHP speak only Vietnamese rather Chinese. In contrast to the MHP, there were Chinese immigrants moving to Vietnam at a later time, especially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y are currently categorized by Vietnamese government as ethnic Chinese (ngươi Hoa), consisting of five major sub-groups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homeland they came from in China. In general, besides Vietnamese, they may maintain their vernacular languages and customs to some extent. Moreover,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Chinese instead of Vietnamese.

Keywords: Vietnam, Minh Huong People, ethnic Chinese, indigenization, identity